

哈尔滨党史资料



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

哈 尔 滨 党 史 资 料

第 一 辑

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

1987·哈尔滨

主 编：冯宝昆 张福山

责任编辑：滕广文 陈 沙 丁朝江

书名题字：陈 雷

封面设计：方 元

校 对：陈 沙 丁朝江

哈 尔 滨 党 史 资 料

第一辑

编辑发行：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综合指导处

印 刷：黑龙江大学印刷厂

1987年8月出版

印数1——3,000册

内部发行注意保存

编 辑 说 明

在漫长的哈尔滨革命斗争中，曾涌现出许多彪炳千秋的英烈。为了把他们的英雄业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，流传后世，并通过革命前辈的高尚品质和革命风格，对党员、群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。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征集到的党史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，汇集成册，分辑内部印发。

本辑汇编的是解放前哈尔滨部分老同志的回忆文章，对编写和研究地方党史的同志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。遗憾的是，本辑回忆录的作者大都不在人世了。尽管前辈们以亲身经历和饱满的热情，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但终因年代久远或记忆淡漠等原因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漏之处。为此，对某些模糊之处，我们本着核准史实的要求都加以注释，对暂时不能核准的史实，则尊重作者的原意，予以保留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时间仓促，难免有许多疵漏及不足，恳请读者原谅，并欢迎提出指教。

编 者



陈
为
人



郭 隆 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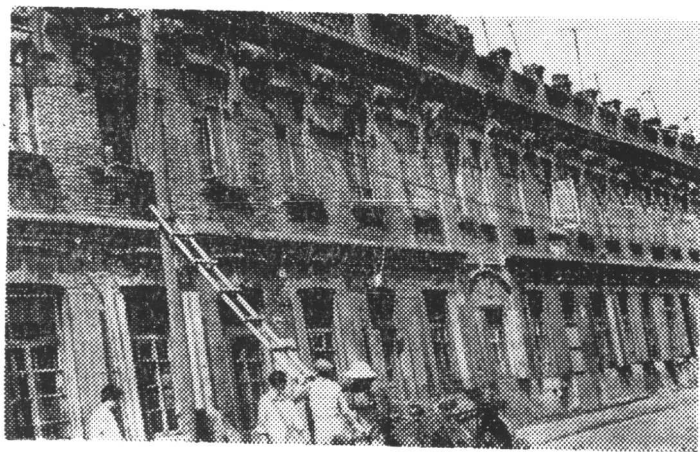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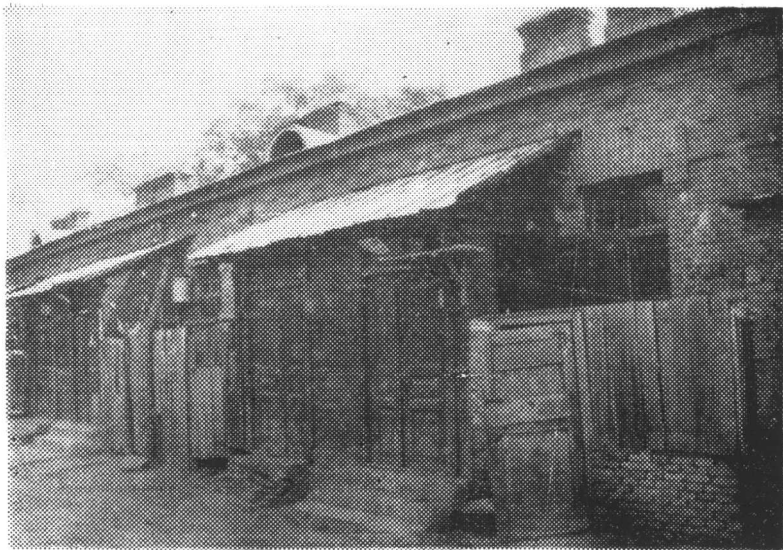
吴 丽 实

右图：《哈尔滨日报》社旧址，现道外升平二道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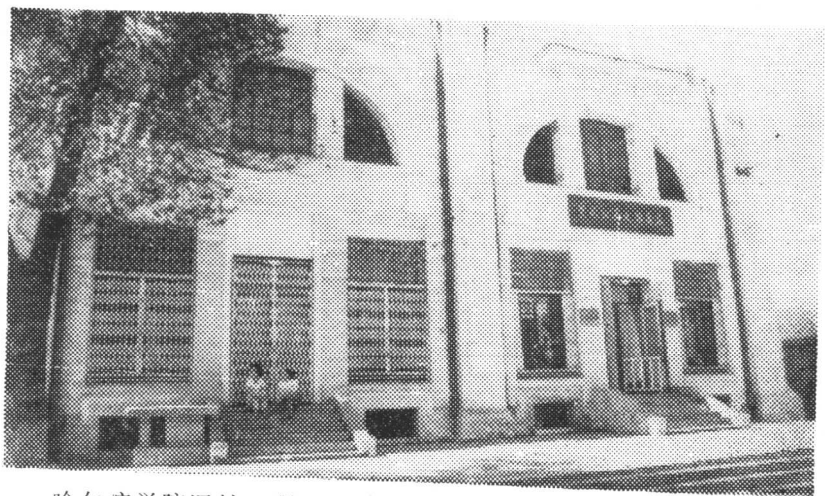


下图：《晨光报》社旧址，现道外北十四道街





三十六棚工人柴好的家，1930年2月刘少奇曾在这里召开过中东路工人代表会议，现道里区河广街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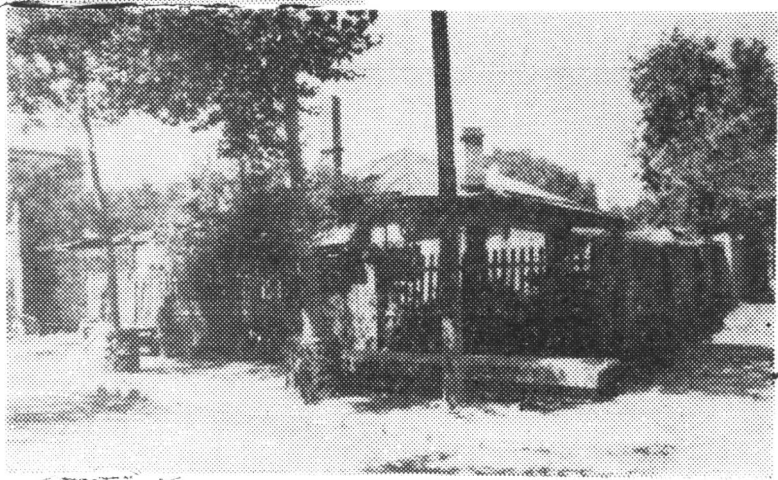


哈尔滨学院旧址，现红军街省文物商店

下图：满洲省委机关旧址，现南岗区光芒街二十二号

（原小戎街二一号）

冯仲云



目 录

关于救国唤醒团及其它.....	韩迭声 (1)
忆陈为人同志.....	韩迭声 (10)
关于陈涛, 骆森、吴丽实, 陈晦生在哈活动 情况.....	李直斋 (15)
我的革命生涯.....	张有仁 (19)
关于北满地区党的早期活动情况.....	胡步三 (30)
早期哈尔滨党的活动.....	高诚儒 (34)
关于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二七年哈尔滨党的组 织情况.....	高伯玉 (40)
回忆我在中共北满地委做秘书工作.....	陆 庚 (44)
我和吴丽实在哈工作的一些情况.....	吴宝泰 (47)
早期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情况.....	杜省吾 (52)
在哈尔滨的二、三事.....	纪锦章 (61)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哈尔滨党部.....	甘景孟 (68)
东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他.....	阮节庵 (72)
在哈尔滨护送“六大”代表的回忆.....	杨之华 (76)
革命生涯片断.....	高鸣千 (78)
哈尔滨早期学运和一中平民夜校.....	侯介夫 (81)
刘少奇和哈尔滨早期工人运动.....	唐宏经 (93)
全总代表在我家开会.....	柴 好 (102)
忆哈尔滨学院师生的反帝斗争.....	韩 光 (110)
哈尔滨学院与反帝大同盟.....	朱新阳 (117)

✓《哈尔滨新报》与《东北红旗》.....	何耿先 (122)
“九一八”前后东省特区一中.....	马荣选 (128)
哈工大的骄傲.....	于开泉 (131)
回忆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.....	王雨山 (136)
党领导平民女子工厂工人的斗争.....	刘桂清 (140)
忆在哈尔滨从事反日斗争.....	罗 烽 (146)
哈尔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日抗日 斗争.....	冯仲云 (151)
东省特区警备队起义前后.....	杨佐青 (157)
我任中共满州省委交通员期间的战斗 生活.....	薛 雯 (162)
关于满州工人运动的回忆.....	王守贤 (173)
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.....	李 芳 (201)
在列车上跑交通.....	李春荣 (204)

关于救国唤醒团及其它

韩 迭 声

我于1893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青坨庄。祖父是富农，父亲是贫农，后为收破烂的小商人。我十九岁初中毕业，适值辛亥革命。当时我任小学教师，同时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。1915年，我离开了家乡到哈尔滨邮局工作。当时袁世凯窃取了总统，卖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，签订了二十一条丧权卖国的密约。哈市爱国人士召开救国图存大会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反帝性质大会。1919年10月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。我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三个字，并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救国运动。

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之下。我们在哈尔滨市成立了“救国唤醒团”，唤醒哈尔滨市的各界人们起来救国。1921年我东北三省在哈尔滨市第一次兴起反帝（特别是反日帝）旗帜。同时进行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。

这里把日俄争夺我东北三省的事实重温一遍，我想是有必要的。1894年，中日战争开始，腐朽透顶的清王朝被击败后，割辽东半岛并赔款二百亿。而俄帝别有用心地表示不同意，便约同德、法两帝向日本施加压力，使日帝让出辽东半岛，增加赔款三十亿。之后俄帝竟把旅大攫为己有。因此，便引起日俄战争（1904—1905年）。俄败，辽东半岛仍被日帝夺去。中国领土，日俄两帝，夺来夺去，我国当局软弱无能，莫敢谁何。而日俄帝国主义踏进我国境内，如入无人之地，为所欲为。

此后，日俄两个帝国主义，把我东北三省分为南满和北满

两方对抗阵地。即由长春直达旅大铁路为南满地区，完全在日帝支配之下。以哈尔滨为中心点，哈长铁路和满绥铁路，都属于俄帝的势力范围，为北满地区。在南北满势力范围之内，日俄的商业、金融、铁路、市政等应有尽有，为所欲为，俨然之国，以哈尔滨市论，划为三区。即道外（傅家甸）为华商和居民区。南岗（秦家岗）、道里为俄侨工商业和居留地。举凡军警、司法、市政都在俄人管理之下，我国不能过问。南岗为各国领事馆，外侨居留地，而中国不能染指。

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，列宁于1919年宣布：对我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。但当时我国反动当局，不愿承认社会主义的苏俄，因此没有接受列宁的宣言。按照中俄合同规定东省铁路权利各半。但事实上，一直到1924年之前，铁路的管理权和行政权完全都被沙俄方面把持着。

沙俄妄图把我东北三省攫为己有，称霸远东。而日本帝国主义，自明治变法维新以来，日渐强盛起来。他们的战略决策是，以朝鲜为跳板，入侵我东北三省，然后长驱直入我内地。日首相伊藤博文（后为朝鲜革命志士刺死于哈尔滨车站）著有《并吞中国策》一书，已昭然若揭。日俄两帝国主义的矛盾日趋激化。所以日俄之战争，不可避免的爆发了。

令人气愤的是日俄两国的战场，并不在交战国的那一方面，而是在我东北三省境内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未免欺人太甚。

不仅如此，战争的人力和物资供应，无不取之于我东北三省，抓壮丁、抓民伕强迫我东三省无辜受祸的老百姓为他们战争服务。土地被践踏，人民被奴役，这种残酷遭遇，沉痛的教训，东北三省也算是突出的。

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南满为据点，向北满进攻。他们在北

满以哈尔滨为中心，企图垄断北满的金融市场。除已成立的朝鲜银行、正金银行外，还勾引收买地方劣绅，要成立滨江银行。由于遭到爱国人士的反对，未能实现。当时北满沙俄势力逐渐消弱，日本工商业者乘机而入，填补商品市场的空白，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者竞争极为激烈。比如1922年4月1日我国官僚资本家成立了有二十万资本的滨江粮食交易所，获利甚多（北满粮食产量是丰富的）。而日本资本家便集股二百万资金成立粮食交易所，欲与我国对抗，然后把我国的滨江交易所吃掉。当时滨江交易所慌了手脚，但又不好由官方出头，制止日本人成立这种类型的粮食交易所。

当时“救国唤醒团”召开紧急的联席会议，决定奋起抵制日本成立交易所。动员爱国的工商业者执行两条实际措施：一不准任何人与日本交易所发生联系去讲交易；二是如有败类与日本交易所发生联系，即以人民公敌汉奸论处。这两条决定宣布后，得到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支持和帮助，他们不与日本交易所发生联系，使日本交易所冷冷清清无人问津，只好关门罢了。这次斗争的胜利，鼓舞了人民的士气，说明了只要群众团结起来，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。

1898年，德国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租占青岛，并筑胶济铁路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，青岛应归还我国，而日本乘德国在欧战失败，之机出兵侵入青岛。并借口二十一条密约，青岛应归日本继承。日本帝国主义就以这套来对付我们，有志气的中国人民岂能长此容忍下去！

当时哈市“救国唤醒团”的领导者奔走呼吁，向群众、向工商业者和地方的开明绅士们建议召开救国会议。振臂一呼，响应者数万人。我们在露天大会上进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爱国宣传，使群众义愤填膺，慷慨激昂，奋起救国。大会后游行示威，串大街过小巷，边走边喊：打倒日本

帝国主义！坚决不承认非法的二十一条！还我青岛！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等口号。

当游行大队走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附近时。日本新闻摄影记者正想摄制游行大队影片。被义愤填膺的群众起来制止，把他的相机砸碎了，吓得日本记者抱头就跑。事后日本一位记者说了一句真实话：“我们不怕中国军阀，就怕中国群众起来。”日本领事馆向我官厅口头要求赔偿相机，我国官厅以群众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为理由，拒绝了赔偿。

我们的“救国唤醒团”领导成员共八人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宣传救国只在口头上是不够的。因此要求工商界人士帮助我们建立报纸。得到许可后，遂成立了“晨光”报社，唤醒团的同志们推我任报社总编辑。报纸提倡白话文，鼓吹救国反帝，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同时反封建反军阀混战。凡是“五四”运动提出来的反帝问题，都尽我们可能，宣传给群众。我们的报社就是群众的喉舌，凡是群众想说的话，我们就说出来。群众想做的，我们就尽可能去做。

我们的报社不仅是宣传机关，而且是组织机构。例如当时反帝罢工事件不断在我国各地发生，我们不仅在罢工群众方面进行宣传工作，而且亲身到工商界去，到劳动群众中去。组织召开大会或各社团联席会议，发挥我们的促进作用。又如日本财阀妄想收买汉奸组织银行，控制我方金融。我们唤醒团的同志们便亲自向工商界的爱国人士要求开会，表示抵制汉奸和日本财阀的勾结。当时，我们办的《晨光报》深得哈市进步青年喜爱，销路很广。所得收入除维持报社开支，付给排字工人和报社劳动者报酬外，我们唤醒团八人概不支薪，但是我们的干劲还是很高。

有一天，我们报社来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一个叫骆森（即李震瀛，京汉铁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），一个叫陈涛（即

陈为人)。他们自我介绍，想在我们报社工作。并说哈市各报社的报纸我们都读过了，只有你们的报纸是进步的，所以愿意帮忙。我当时回答的是，帮忙很欢迎，但报社经费困难，不能给以报酬，他俩表示同意。经过一段工作后，他俩向我表明是李大钊同志派他们来哈进行革命工作，只因人地生疏，来了数月还一事未作。我当即答应他们说，哈市各方面我还比较熟悉，也有些有志革命的人，我尽可能给你们介绍好了。这时李震瀛让我加入党组织。但我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，因此还想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再加入。后来我离开哈尔滨进关，1927年经过李震瀛和向忠发介绍加入了党组织。

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大约是1923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空前未有的大地震，灾情严重，人们死伤很多，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。陈为人同志高兴起来，在报纸的“寸铁”栏里写了一段评论说：日本帝国大地震发生是好的…等。这种幸灾乐祸的笔调，当然是错误的，我一时不慎，刊登在报上，日本领事馆向我官厅提出抗议。官厅警告我说：这样胡搞胡来是绝不允许的，今后再发生这类事件，就把报社查封……。日本报纸则攻击我们是暴烈分子，有碍中日邦交。这当然是由于我们经常在报刊上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，使他们胆战心惊所致。当时我们比较深刻地懂得了只有发动群众，唤起群众起来救国，联合工商业者团结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帝工作才会奏效。那时并不知道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，但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。

由于《晨光报》核心领导八人中有了分化，进行派别斗争，即革命与不革命的斗争。加之“寸铁”时评引起日帝抗议，官厅的威吓等情况，使报社同人①中为使用李震瀛和陈为人一事，对我颇有责言，表示不满。因此，陈、李向我提出脱离《晨光报》，另行组织通讯社和青年学院。在我们退出

《晨光报》后，报社的论调就向右转了。1923年9月，“通讯社”成立后即与哈市无线电台取得了联系，凡是电台收到英俄文的新闻都由我们译成中文；凡是反帝的新闻报道，通过我们的“通讯社”尽可能供给本埠和我国各地方的报刊。同时以“通讯社”记者的名义采访新闻。什么地方的机关社团都可以去，什么人都可以会见座谈，按了解到的新闻性质，有积极一面的，也有消极一面的，分别写出评论，予以表扬或批判。

“青年学院”吸收青年学习，不识字的参加文盲班，识字者加以深造。晚间上课，主要讲些时事，对他们宣传反帝、反封建军阀的意义，号召大家奋起救国，参加各种爱国活动。反动派知道后说我们宣传赤化。警察当局是反对我们“青年学院”的，但又不好公开禁止，就派几个警察也来报名参加学院学习。这使原来学习的青年和工人都不敢来了。警察不是来学习，实际上是来监视学院的活动情况。我们的“通讯社”也被加上了赤化的帽子，首先哈市无线电台拒绝供给我们新闻电稿，这样“青年学院”和“通讯社”都陷于瘫痪状态而不能活动了。反动当局对我们三人的监视也越来越紧。在这种形势下，陈、李约我同赴京、津去工作，我不同意。他们俩就走了，并说以后还要派人和我联系。我之所以不愿离开哈市，是由于我在这里已久，人地比较熟悉，只要没有真凭实据，我想反动官厅也不好把我以救国有罪的名义逮捕或驱逐出境。反正群众是拥护我们，同情我们的，但对坐牢的危险也做了准备，要革命就不怕坐牢。

反动当局不放心我搞群众运动，因为群众起来对他们是危险的。这样，我们迫于形势只能进行地下工作。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搞平民教育运动，但必须发动哈市工商业者、教育当局和开明士绅等联合起来，发起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，做为创办平民教育的大本营。1924年我们搞起来了，首先推

举八人出头，申请市政厅批准。但当局（该厅）以有我参加拒不批准，八人中一位傅义年者（开明士绅）向市政当局说有他（指我）能办起来，没有他就不好办了。结果发起人中七人向官厅保证，不允许我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外的其他活动，这才批准备案。平民教育在哈市的战鼓打响了，与轰轰烈烈的湖南和江浙等省的平民教育遥相呼应。我们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发出招生通告，文中有不收学费还送书的语句，当时教育局长程鹏九说，不收学费还送书这句话很精彩，号召力很强。哈市失学的青年、工人以及各方面的劳动者，纷纷报名。入学者千余人，六个月毕业后发给结业证书者，有八百人之多。他们渴望学习的心情真是殊堪钦敬。开展教育的具体办法是利用各学校课堂和公开场所，并请各校教师在晚间给平民学生上课。

当时我和陈晦生（又名陈惠生，陈作霖）同志，对于1925年上海“五卅惨案”有所表示，而反动当局先行指派四名便衣侦探，跟踪监视着我俩，致使我们失掉了活动的自由。我只好在中东铁路管理局，做了经济月刊编辑工作，这就是我在哈市最后存留的一个据点。当时我上班下班和到什么地方去，都有密探跟踪。有一次我上公共汽车（私人办的）风把我的草帽吹跑了，而这位便衣探子，马上给我拣了起来，并对我说，我们知道你们是为人民做好事，但我们是受长官指派，跟踪监视你的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请勿见怪。

约在1925年底（或是1926年初）吴丽实来找我谈，经李震瀛介绍来哈同你接头商量办报问题，并让我负责。我当即回答，办报是我极端同情的，但向官厅批准备案，就不会允许我的，后来我想到前《晨光报》一位编辑穆景周（又名穆靖周、穆本初、穆绍武）比较合适些。就由他出头呈请备案，果然批准了，即定名为《哈尔滨日报》。我与吴约定，